

康有为与晚清改革再认识

——《戊戌履霜录》发微

李泽昊

常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摘要: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康有为的形象从戊戌变法被视为引领历史潮流的人物,到越来越“保守”,乃至逐渐“落后”于时代,经历了一个日益褪色的过程。对于康有为,若不对其个性特质全面考量,便不能理解其中的真原因。《戊戌履霜录》是近代著名传统派史学家胡思敬的代表作之一。尽管胡氏思想保守,但在传统史学理念的指导下,他也会如实揭示出一些主要的历史真相。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有为以一介布衣书生,积极奔走,反复呼号,虽一再受挫,却不遗余力,义无反顾。然而,辩证地看,他的个性、才能对维新变法运动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这绝非低估康有为对维新变法的历史贡献。一个有缺陷的康有为比一个在可能世界里正确完美的康有为意味深长得多,站在有缺陷的康有为背后,能给人以更多的震撼与教益。戊戌政变最终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崩溃。注意到这个客观效果,才能对康有为的历史功过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

关键词: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康有为;晚清改革

中图分类号: K25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3)05-0044-11

戊戌变法是一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产,使人有常议常新之感。对于这一事件,若想解读其中的真原因,感受真意义,需要通过具体的时间段落与人物行迹,抽丝剥茧一般,反复精思缜量,才有可能澄清当事人如何面对事件,做出的涉及个人与国家得失的判断与抉择。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近代著名史学家胡思敬全面反映戊戌变法最具代表性的史著——《戊戌履霜录》为切入点,探讨是书揭橥的戊戌史事,并进一步厘清康有为与变法运动的关系,姑为引玉之砖。

一、胡思敬其人其书

胡思敬是清末民初著名传统派史家,生于儒学世家,幼承庭训,所谓“节义、忠孝养其根”,“孝以事父,忠以报君,夫妇、兄弟、朋友要当各尽其伦”,受到严格的孔孟道统教育。他青年时代碌碌于求取科举功名,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宦海生涯十六载,期间中国迭遭变故,正经历“千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8YJC7100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泽昊,男,吉林怀德人,历史学博士,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年未有之变局”。官场吏治腐败,贿赂公行,但胡氏却洁身自爱,始终恪守传统的道德规范,是朝野上下公认的正人君子式人物。尤其身为御史时,能够忠于职守,不畏权势,大胆弹劾奸党权贵,被誉为“第一诤臣”。^①不可否认,胡思敬所弹劾之人,有很多是主张改革维新者,如袁世凯、载泽、曹汝霖等等,但这些人中确有政治钻营、经济贪鄙之流,其所作所为恰恰成保守派反对变法的重要理由。这种情况,历代改革运动中屡见不鲜,值得深思。在个人生活方面,胡思敬虽家境较为富裕,但却固守节俭。时人曾评论:“其自奉甚俭,食不重肉,惟购书无倦”。^②而经常攻击胡氏者也只能以“思想迂顽,不达时变”^③讥之,对其道德品格并无指摘之处。清朝覆亡后,胡思敬拒不入仕民国,寄身于著述立说之中,甘为遗民以终老。

胡思敬一生嗜书如命,性好与典籍为伴。民国建立后,他开办“江西全省图书馆”,开辟了近代江西省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河。当时,他的藏书量居江西全省之冠。胡思敬不仅阅读和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而且著述颇丰,流传于世的有《退庐文集》《退庐诗集》《退庐笺牍》《古文辞类纂补》,以及享誉史坛的《戊戌履霜录》《驴背集》《国闻备乘》《盐乘》《审国病书》《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丙午厘定官制刍议》,多已散佚的《圣武记纂误》以及编纂草成未能刊印的《大清通纪》等等。

在历代王朝末期的史家著述中,多有官场腐败成风、吏治坏乱的记述,清末绝大多数史家也不例外。胡思敬的“另类”之处在于,作为传统派史家的他,在“揭丑”问题上并没有对君亲隐讳,而是直指其非。他在当代史的著述中,甚至直斥慈禧太后为“罔利招乱”的始作俑者,指出贪贿之风真正甚嚣尘上,是从慈禧太后毫无顾忌地收纳“报效”开始的。在胡思敬看来,慈禧太后以“妇人之私”做了很多贻误国家的大事,概略言之,主要有四点:一是为维护个人权威,挑选幼儿做皇帝。“穆宗崩,孝钦不为之立后,且威逼穆皇后至死,母子之恩绝矣”。“孝钦之立德宗,以为姊妹之子犹己子;其立隆裕,以为兄弟之女犹己女,皆妇人之私也”。^④二是慈禧违反清代不让女主垂帘的定制。在《国闻备乘》中甚至多处记述慈禧为夺权而暗地害死慈安的传闻。^⑤三是慈禧违反不准宗室参政的祖制,并把朝政大权接连交给几位王爷,不管他们如何昏庸贪鄙,只要忠诚恭顺就行。胡思敬斥责慈禧道:“恭王出而礼王复入,礼王出而庆王专政,累七八年之久,一若满汉大臣皆不足信,惟宗亲可以托国者,此殆孝钦妇人之见”。“明知奕劻劣迹,冀其贪财纳贿之外,别无他肠,亦遂倾心任之,不为外论所撼,盖暮年经变之后,惟冀及身无事,非有志于求治也”。^⑥四是慈禧为一己私利,谋废光绪帝。此举遭到朝中诸多王公大臣的反对。“进谏者咸以列强仗义执言为辞,事遂中辍”。不久,她在对“联拳抗洋”的问题上要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手腕,终招致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弥天大祸。在《驴背集》中,胡氏写道:“以一国挑衅全球,无端围杀公使,辟阙左为战场……朝廷办义和拳,诏书前后反覆,始曰乱民,令中外发兵捕之,已闻诸匪势盛,阴以权术笼络,练为乡团,又曰团民、曰拳民,既而载漪用事,倡议主招抚,直以义民呼之……及北都沦陷,乘舆播迁,太后恨义和拳刺骨,于是指义民曰拳匪”。“两宫既达

① 刘廷琛:《胡公漱唐行状》,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第25页。

② 刘廷琛:《胡公漱唐行状》,第67页。

③ 胡思敬:《覆赵笠垣书》,胡思敬:《退庐笺牍》卷一,江西南昌退庐,1924年影印本。

④ 胡思敬:《国闻备乘》,江西南昌退庐,1924年影印本。

⑤ 详见《国闻备乘》卷一“文宗遗命得人”“慈安防患之密”,卷二“文锡”,卷三“宫纬疑案”。

⑥ 胡思敬:《审国病书》,江西南昌退庐,1923年影印本。

西安,皆言宜下诏罪己,枢臣撰拟不敢归过于上,但云‘乱之萌匪’”,“读者皆掩口而笑”。^①

当时,尚在朝中做官的胡思敬,在私人史著中揭露最高统治者的丑恶,直击宫闱疑案,似乎已属大不敬之列,但胡思敬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

古人讳尊、讳亲之说,亦为过小者言之;若大恶可讳,则桀、纣之残暴谁为播扬于后世乎!周公诛管、蔡,亲加刃于其躬,尚无不可,更何论死后之褒讥!操史笔者,但不当掉弄楮墨以快一己之私仇,他非所惧也。窃守此义,以待来者。^②

这充分表现了胡思敬在历史记载上,将史学看成具有一种独立准则、独立地位的思想,即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容隐讳,在史学传信万世、鉴戒百代的宗旨下,不受忠于君主等纲常伦理的束缚。这种史学思想,符合于传统史学中理想的直书实录原则,且有新的发挥。胡思敬固然终生以清朝臣子自居,但他忠于旧文化和旧道统,要超过对最高统治者之忠。这种政治立场,是一名汉族官员完全坚持儒学传统思想、恪守旧的文化理念的典型代表。

清朝灭亡后,赵尔巽、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于式枚、吴士鉴等等“遗老”,均加入民国组织和资助的纂修清史活动,承认清朝灭亡和民国政权的建立。但是纂成的《清史稿》却讴歌清朝统治,诋毁辛亥革命。而胡思敬不承认民国、甘为遗室遗民以终老,其在拒绝民国各级政府、各级官员的聘请、延揽的同时,辞却了江西省长戚扬的修省志之邀,也不参与民国组建清史馆的修史活动,然而,在个人所修的史著中却尖锐抨击清季时政、吏治,并令统治者的丑态曝光于史册,即胡氏虽严格忠于清朝,却不惜批判清朝的政治及统治者的阴暗行为。两相对比,反差甚大。我们不得不承认:胡思敬在坚持传统政治道德上、在奉行传统史学准则上,都远远超越赵尔巽等人。

在中国史学史上,记载史事是否属实,并不决定于其政治思想的先进与否,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载笔人具有多大程度的直书、实录理念。司马光虽是坚决反对变法的守旧派,但纂修《资治通鉴》则仍能遵循信史准则,即为明证。而激进的革命人士出于宣传目的,也会写出不实之辞。就戊戌变法的史料而言,梁启超所撰著的《戊戌政变记》,就存在诸如极力美化光绪帝、颂扬其“圣德”的隐恶虚美的现象,致使部分史料记载真假难辨;康有为则在《戊戌奏稿》中声称,在百日维新期间他向皇帝上呈了将近四十份奏议和书序,这些奏议和书序在1911年由其女婿麦仲华编辑出版。然而在最近二十年的研究中,汤志钧、黄彰健、孔祥吉等学者已经指出,该书的一些奏议和书序在清廷档案中并不存在,它们很可能是康有为了变法失败并逃亡海外后修订或伪造的。这些发现所导致的不仅是有关康、梁著述可信度的问题,更有如何利用这些史料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问题。尽管学者们相继揭露康、梁在其著作中的作伪,却一直苦于缺乏足量的新史料可供其另辟蹊径。胡思敬虽然思想守旧,但在传统道德、传统史学理念的指导下,他也会如实揭示一些主要的历史真相,因此,只鉴于其逆潮流而动的政治思想,便对其所撰史著不加重视,这种因人废言的态度显然是偏颇的。从学术角度而言,对革命派与保守派史家的史著不应取此弃彼,而要加以辩证地考察和分析。

① 胡思敬:《驴背集》,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② 胡思敬:《国闻备乘》,江西南昌退庐,1924影印本。

二、亲历者的诉说：甲午战后的晚清政局

学界一般认为,历史事件亲历者、旁观者和研究者,对事件的视角和认知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在戊戌变法的问题上,胡思敬不仅是亲历者,同时也是研究者。在胡思敬看来,变法改革的实践并非只局限在“百日维新”这短暂的一刻,而是从《马关条约》签订后便已开始。《戊戌履霜录》记述说,“日难初平”后,“李端棻言学,荣禄、胡燏棻言兵,翁同龢议设昭信股票,新政始萌芽矣”。^①这一观点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中日甲午一战,堂堂“天朝上国”竟惨败于东洋岛国日本,这一事实对中国朝野上下的刺激、震撼是空前强烈的,它使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同程度地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开始从各自的角度来思考国家的出路。同时,统治集团内部要求在军事、教育、财政等方面进行改革的呼声也逐步高涨。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1895年5月11日),即中日换约后的第三天,光绪皇帝便号召群臣“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以收自强之效”。^②由此,清王朝新一轮的改革开始了。

顺天府尹胡燏棻的主张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③当时,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各项主张在袁世凯、刘坤一、盛宣怀、李鸿章诸大臣的奏章中也都提出来了,他们的言论在《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光绪政要》中存留甚多。值得注意的是,清最高统治者对这些变法主张不以为忤,且连发上谕,把应兴应革各事归纳为十六项,要求大小臣工“因时制宜”,“悉心妥筹”,“实力讲求”。^④统治者昭之若揭的图强之心,奏响了维新变法的序曲。综观这三年的变法,清政府所“采择施行”^⑤的各项改革举措,已远远超出了前三十年办洋务的框架,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在文教、实业、军事等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因此,就改革主体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政治层面发挥作用是有限的。

就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而言,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上主要集中在康有为的著述上^⑥,突出其历史贡献和思想启蒙作用,但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同样积极参与改革,更为广泛的官僚群体,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就曾上疏建议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发给群臣讨

①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②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80页。

③ 胡燏棻:《顺天府尹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之道》,沈桐生:《光绪政要》卷二,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16页。

④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631页。

⑤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888页。

⑥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说成是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是值得商榷的。康氏的“两考”,当时虽在学术思想界引起震动,但除康门弟子和少数人外,几乎受到新、旧人物的一致反对。代表人物如朱一新、洪良品、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王先谦、叶德辉甚至张荫桓、郑孝胥、陈庆年、章太炎等等,在他们的日记、书信及戊戌变法时期的奏折中,都对康有为的学说不以为然。关于“两考”先后被朝廷以上谕的形式诏令毁版的情况,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已有精详考证,兹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改制考》是在维新变法的高潮阶段由支持光绪皇帝新政措施的大臣陈宝箴和孙家鼐建议而饬令毁版的,并非守旧派官僚所为。

论。^①对此,胡思敬评述道:“其书虽言变法,皆咸同以前旧说,近三十年中,时局大变,诸通人已弃置勿道。”^②显然,在胡氏的眼中,成书三十多年的《校邠庐抗议》中的诸多具体见解,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已经显得陈旧落后了,但冯氏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非常适合大部分站在传统立场但却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从而受到他们的赞赏。^③在孙家鼐上疏的当天,光绪皇帝发出上谕:“着荣禄迅即饬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④而荣禄则非常积极执行光绪帝的决策,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光绪皇帝交办的刷印《校邠庐抗议》一千部解京备用的任务。随后,中央官员通过对《校邠庐抗议》的签议,展开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

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官制改革问题上,焦点是裁减冗员和吏胥专权的问题,官员们普遍主张在稳定的前提下,量裁和缓裁冗员,主张裁减中央和地方一些不合理的机构,对候补官员,在给予一定补偿的前提下量减。对吏胥问题多数官员主张在考虑社会承受力情况下做出改变,如简明则例,寻求可以替代吏胥的人选等;在教育改革问题上,大部分官员主张变革传统的科举,在科举考试中改革考试内容以适应时代需求,发展新式的学校教育,但要保留传统儒家经典。学校教育、科举取士、社会推荐多途径的培养和使用人才模式已经逐渐成为官僚群体的共识;在洋务改革问题上,很多人主张在继承洋务运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适当引进一些西方政治思想,甚至不再拘泥于中体西用的学说,而是着眼于中西学之间的融合;在对外政策上,大部分官员主张国家应该确定以和为主的外交发展方针,警惕俄国的威胁,积极寻求联英、联日来达到同盟外交,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总之,这场依托签议《校邠庐抗议》所进行的改革大讨论,可以说是晚清三十年改革意见的一个大汇总。在近万件的改革建议中,敌视和明确反对改革的并不占主流,大多数的官员都对正在进行的改革抱支持和理解的态度,并提出一些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改革主张。但遗憾的是,这场大讨论因戊戌政变的发生而停止,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讨论结果^⑤。

就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来说,光绪帝的维新变法要求和迫切心情自不必说,即使是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在当时也是穷极思变的。其实,光绪帝亲政后,真正掌握朝政大权的仍是慈禧太后。《戊戌履霜录》卷二中有载:“上(指光绪帝)由藩邸入承大统,谨事太后,不敢示异同。”另有两条史料可资佐证:其一,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曾称,慈禧归政后,“皇上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太后之手”^⑥;其二,出自恽毓鼎的记载:“上既新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⑦这种情况也可以从极力辅佐光绪帝亲政的帝师翁同龢,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30页。

②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③除《校邠庐抗议》外,在百日维新时期,张之洞的《劝学篇》影响也很深远。当时无论趋新或守旧的人士都认为是可以接受,且在文化底蕴上显得比康有为的学说更为深厚沉实,这部书很快占据了当时众多士大夫的心。详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40页。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廷签议校邠庐抗议档案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

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56页。

⑦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0页。

稍有不中慈禧之意便被罢黜一事证明之。此外,《戊戌履霜录》在记述光绪帝从事变法活动时,多处有“上奉皇太后”之语,显然,帝之所为有奉命行事之意味。而据学者孔祥吉统计,仅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就曾12次专程赴颐和园拜见慈禧,这些会见绝不单纯是礼仪性的,康有为呈递的变法条陈和《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等均是在此时由光绪帝“恭呈慈览”。^①在这种情势下,光绪帝所推行的维新变法的各项重要举措,必然都要事先经过慈禧太后的首肯,否则的话,变法运动决不会在慈禧的鼻子底下搞下去的。从这些史实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清廷两位最高统治者都是倾向,甚至可能是主张变法的,若着意把慈禧太后说成是维新变法的天敌,认为其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确实缺乏历史根据,至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

综上所述,在当权者的倡导下,“数年以来,中外臣工,多主变法自强”^②。就统治集团的整体而言,在甲午战后,其对维新变法的态度是相当积极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刚毅、徐桐之流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谬论依然存在,也不否认保守思想在当时仍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甲午战败及瓜分危机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纷纷起来救亡图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把代表现代科技文化的“西学”,纳入了丰富、提高自我的文化视野内,逐步走出了封闭的文化传统。可以说,甲午战后确是改革的大好时机。而机遇终为泡影,不能简单归咎于客观环境,实事求是地讲,康有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时人眼中的康有为

胡思敬是清末民初政坛有名的保守人物,《戊戌履霜录》中,胡氏对康氏的攻击之语随处可见,这也正是此书倍受訾议之处。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甲午战败及西学东渐潮流的影响下,胡思敬也曾对西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手抄政治、舆地、洋务书不下数十百种”^③,对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期间大办实业的做法予以赞扬^④;而在《戊戌履霜录》中,他也着意将参与变法的二十七人分为“康党”与“新党”两类。“新党”均为主张变法者,对陈宝箴、陈三立、吴大澂等十八位“新党”人物,因“堕康党术中”而“牵率得祸”^⑤的遭遇,胡氏表示出一定的惋惜之情。之后,在奏疏中他一再称“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锐二人,“素行敦谨,尚非一意附和,颇有可惜”,流露出愿为其“剖白昭雪”之意。^⑥因此,就当时胡氏的思想特征而言,是在守旧与趋新“之间”。这“之间”并非胡氏身上所独有,而是朝野众多人物令后人难忘的对立特征:卓越和拙劣,远见与短视,先锋与过时,激进与保守,全都因为这个“之间”。沈曾植曾致函文廷式,表示:“论时局,谓世事非变法不可为,而深忧变法之机将被康有为卤莽裂灭,中生变阻”^⑦;郑孝胥也表示不反对变法大局,只是深恐康有为“噪进不

① 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0页。

②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③ 胡思敬:《答赵芷荪书》,胡思敬:《退庐笺牍》卷三,江西南昌退庐,1924年影印本。

④ 胡思敬:《国闻备乘》,江西南昌退庐,1924影印本。

⑤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⑥ 胡思敬:《请禁止国事犯名词折》,胡思敬:《退庐疏稿》卷四,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⑦ 文廷式:《文廷式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504页。

已”,会造成“因噎废食,祸及贤者”的局面^①。

在《戊戌履霜录》中,胡思敬斥责康氏“素行不检,颇干与外事,阴持大吏短长,粤人援手咤骂,比之邪匪”。^②在康有为的性格特征当中,留给胡思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霸气十足,狂妄自负。他说,“有为顾身修髯,目光炯炯射人”,“敢为大言”,“携其所著书曰《新学伪经考》者,遍谒朝士大夫,或传其字长素,盖以素王自比,争呼‘圣人’揶揄之,有为益喜自负”,所著《孔子改制考》,亦显示其“大有为中国教皇之意”。^③对康有为品行及其“康学”厌弃如此之深的,这并不是个案,《戊戌履霜录》能够在朝野上下引起轰动,被推崇备至,也并非只是保守派的极力鼓吹。当时,力倡变法的张之洞,也授意幕僚皆以撰文批康有为为时尚。他们还经常评议康的人品与学术,换言之,任何反对康有为的做法都得到了张之洞的赞许。^④甚至民国之后,还有史家顺着胡思敬的思想路径写史立说。魏元旷的《坚冰志》便是其中的典型。该书声称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行动“诡譎”,“终日怀刺”。而清廷没有及时“见微知著,治于未乱,保于未危”,结果造成“坏法乱纪、弃礼蔑义”,最终导致清朝灭亡。所谓“履霜”、“坚冰”之语绝不是偶然的。《周易》卦辞曰:“初六,履霜,坚冰至。”孔颖达疏曰:“初六,阴气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践其霜,微而积渐,故坚冰乃至。所谓阴道初虽柔顺,渐渐积着乃至坚刚”。在《坚冰志·序》中,作者写道:“于履霜而逆,以坚冰为戒,所以防渐虑微,慎重于始也。”^⑤这显然是受到胡思敬的影响,《履霜录》与《坚冰志》实为同一机杼。

如果认为胡氏等人对康有为颇存成见,对其品行、性格的描述有失公允的话,那么作为康有为的胞弟,“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的评述当较为中肯。他曾评价康有为“伯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⑥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而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二十余年,对其知之甚深,他的言论当更为真实、客观。梁启超称其师是“自信家、冒险家与理想家”,即有理想、个性鲜明、有自信,但非是务实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实行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评述说:“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象,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这段话虽旨在描述康有为学佛修行、大彻大悟时的状态,但同时也大致概括出了康有为的个性特征。“先生有图章一,上刻‘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其气概若此”。^⑦

的确,若考诸康有为平生所为,可以看到他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的个性气质。康氏早年在“万木草堂”讲学之时,弟子们恭维他为孔子那样的素王(即无冕之王),他不仅欣然接受,且意犹未尽,乃自号“长素”,即要压孔子一肩,比圣人还要圣人。而他为五个得意门生起的名号,个个非同凡响:陈千秋号“超回”,即超过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轶,超车之义,子贡(姓端木,名赐,子

①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05页。

②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③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④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⑤ 魏元旷:《坚冰志》,魏元旷:《魏氏全书·潜园杂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

⑥ 康广仁:《康幼博茂遗文·致易一书》,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2页。

⑦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陈引驰:《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7页。

贡是其字)只能瞠乎其后;麦孟华,号“驾孟”,即要驾在孟子头上;曹泰,号“越伋”(孔伋,即子思),曹泰要越过子思;韩文举号“乘参”,被人戏谑为“把曾参当马骑也”。^①对于康有为这种傲形于色、不可一世的心态和举动,保守派自然无法接受,而思想激进的人士颇感不满者也大有人在,章太炎便是其中一显例,他曾说:“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②

学界的一些具体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这位“惟我独尊,以孔子之后的唯一圣人自居”^③的康有为,不仅是位“骄傲不群、木讷乖僻,而又顽固急躁的知识分子”^④,而且在品行处世上存在一系列问题:巧取豪夺他人收藏的文物,授人以话柄;个人私生活不甚自律,言行不一,“日谈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多次伪造档,篡改历史记录,夸大自身作用,“好篡改‘我史’,也好篡改旧作的时间与内容,文过饰非,冒充先知”,“没有一名严肃的史学家敢于轻信他的自述”。^⑤总之,与“南海圣人”的名号实在难以相称。

四、得失成败论书生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领袖人物道德品行是否高洁,并不是决定其政治主张是否成功的根本因素。就戊戌变法而言,康有为的个性特质也不可能是变法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康有为对变法最直接的影响力在其著作及一封封的奏疏中。尽管《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鼓舞着光绪帝,但下诏让群臣讨论、学习的却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与张之洞的《劝学篇》。可见,在光绪帝心目中,康的著作并非是最合时宜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人的个性特质与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康有为身上“惟我独尊”的个性特质体现了其所具有的“理想之宏远,热诚之深厚,胆气之雄伟”^⑥。康有为曾手书一联:“大翼垂天四万里,长松拔地三千年。”^⑦而一首《秋登越王台》更将其睥睨云天、横目八表之气概展现无遗:“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临睨飞云横八表,岂无倚剑叹雄才?”^⑧光绪十四年(1888年),时为清政府最高决策集团中的翁同龢第一次见到康有为,便对其印象甚为深刻,在日记中,翁氏写道:“康祖诒(康有为,字祖诒)狂甚”。^⑨这里所用的“狂”字并非贬义,作为帝师和军机大臣的翁同龢,被康有为变法图强的一席话所打动,后来他在光绪帝面前大力保荐康有为,成为联结康有为等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

考诸康有为一生行迹,很难排除其在戊戌变法中图谋个人发展的动机。毕竟,功名对于传统士人有着无穷的魅力,旧时代功利主义在康有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当这种个人与社会前进方向一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

②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页。

③ 蔡尚思:《再说康有为——万木草堂遗稿序》,刘善章、刘忠世:《康有为研究论集》,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④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348页。

⑤ 龙应台、朱维铮编著:《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纪·导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8页。

⑥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陈引驰:《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5页。

⑦ 车吉心:《民国轶事》第二卷,济南:泰山出版社,2004年,第455页。

⑧ 康有为:《秋登越王台》,陈永正:《康有为诗文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页。

⑨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年。

致时,就能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趋势,它所体现的进步意义便值得肯定。在康氏的个性特质中,蕴含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及“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这份使命感和责任感,赋予了康氏坚定的自信力,成为支撑其对理想、事业执着追求的内在动力。梁启超曾这样称赞其师曰:“先生最富有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有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谄取事物以佐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①的确,康有为一介布衣书生,在国难当头之际,如果没有这份使命感与责任感,他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十年之内七次上书。如果没有超凡的胆识与自信,他自然不会为旨在“大变”“速变”“全变”的维新变法运动中积极奔走,反复呼号,虽一再受挫,却不遗余力,义无反顾。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种“惟我独尊”的个性特质,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对维新变法运动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使康氏在名满天下的同时,却也谤满天下。这样说,绝非低估康有为。一个有缺陷的康有为比一个在可能世界里正确完美的康有为意味深长得多。因为,站在有缺陷的康有为背后,能给人以更多的震撼与教益,“诸政得人而理”并非虚言。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主要理论武器。两书刊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被康氏门生称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②但是,惊诧者众,反对者多,接受者实为寥寥。当时,康有为没有以严肃态度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似乎也认为没有认真论证的必要,其出语处处以口含天宪的圣人自居:“天哀生民”,“予小子(即指康氏自己)梦执礼器而西行,乃覩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不敢隐匿大道。”^③于是,作为救世主的康有为便衔命而出了。难怪章太炎会充满嘲讽地说:“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④

也许有人会为之辩护,认为康氏的著述不能在学术上苛求,主要应从现实政治需要的层面去理解其巨大的意义。正如康氏自己所言:“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⑤即利用儒家学说和孔子的偶像进行宣传,可以减少来自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压力。但就理论的实践效果而言,康氏的变法理论不仅为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借口,而且也导致众多处在守旧与趋新“之间”的官僚、士绅为之反目:胡思敬攻击康氏离经叛道,主张对其著述予以禁毁;“御史安维峻见其书,大恶之,密具疏纠参,比之少正卯”;“湖南举人曾廉劾有为觊觎非常”,“以孔子为摩西,而已为耶稣”。^⑥

损害最大的还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新学伪经考》留给翁同龢的印象是“直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他惧怕因康的轻狂躁进而贾祸;管学大臣孙家鼐为“东宫旧僚”,“主变法”,曾面请康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观《孔子改制考》后,也心存芥蒂。^⑦地方实力派中,力倡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曾上疏,请毁《孔子改制考》^⑧;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大力支持强学会及《时务报》的活动,亦“不

① 王云五、杨克己:《民国康长素先生有为、梁任公先生启超师生合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8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第78页。

③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88页。

④ 章太炎:《致谭献书》,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二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第583页。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7页。

⑥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⑦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⑧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信孔子改制”，劝康有为“勿言此学”。^①

对于维新变法的大局而言，这些矛盾的产生已是节外生枝，但如能妥善处理，尚属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康有为自道：“香涛（即张之洞）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指注资强学会）。又使星海（即梁鼎芬）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②张之洞劝康有为“勿言此学”，以免因学术分歧导致政治上的被动，实为睿智的忠告，而康氏却毫不理会，可见当时康氏自大狂狷的程度。康有为常对人说：“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有进。”对张之洞如此，对其他维新同道的态度也不客气。在民间，章太炎与康氏门人相遇，“辄如冰炭”。他不同意康氏神化孔子，“康有为门徒竟至‘攘臂大哄’”，扬言要揍他，“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③

王国维对康有为的评价切中肯綮：“康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摹仿基督教，其以预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德之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失败也。”^④的确，康有为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触犯了主流社会的大忌。在时人眼中，他宣扬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说、“伪经”说，其实是宣扬康氏自己，神化孔子归根到底是要神化自己。他的言论除了能耸动时人的视听，引起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并造成革新派内部的冲突和分裂外，对戊戌变法的大局着实无益，甚至有害。

戊戌变法是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全局性变革，它的每一步骤、每一措施不仅应有进步意义，而且应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所承受。而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多达百余道的新政诏令，社会实难承受。时至9月，维新变法已阻力重重。然而，康有为偏偏郑重其事地上书，请求“断发、易服色”，“改元开化”，甚至要把国号改为“中华”二字。服式、发式、纪元对于维新改革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形式，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随着局势的发展，社会上对康氏的不满情绪逐渐强烈。面对大小臣工弹劾康有为的奏疏，光绪帝“独用有为变法，排众议，毅然行之”^⑤。太后闻之此事后，“恚曰：‘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光绪帝）闻太后恚怒，有违言，内不自安”。^⑥康有为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已流言广布，维新事业岌岌可危。

中国历代变法艰难，唯明君强臣，戮力齐心，方有可能成功。光绪帝是否为明君，姑且不论。强臣者，须精通政务，有经国大才。而康有为恰恰缺乏统筹、驾驭全局的才能。这位向以“帝王师”身份自居自重的人物，除了皇上，朝野英彦罕有能放在眼里者。这点通过下面两则事例得窥一斑：孙中山曾慕康氏之名，托友转致结交的忱悃，康有为答复道：“孙某如欲结交，宜先具门生贴拜师乃可。”^⑦此言过于托大，使孙中山心中甚为不平；李鸿章曾主动提出出资入强学会，亦遭康氏师徒严拒。李鸿章在政坛几十年，门生故吏满天下，虽在甲午战败后一时失势，但却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拒会”一事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35页。

②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35页。

③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3页。

④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傅杰：《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

⑤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⑥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⑦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页。

实在对维新事业没什么益处,只能徒增时人对康氏的反感。当陷入日益孤立的困境之时,康有不为不是冷静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归结为慈禧一人。为扫除障碍,他欲策划发动兵变,捉拿慈禧。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慈禧太后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太后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①对于戊戌变法的失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罪责难逃,同时康有为个性因素对维新事业的消极影响也难辞其咎。

甲午战败、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与清末新政是中国19、20世纪之交接连发生且有一定因果关系的四件大事,戊戌变法实为这条因果链中的关键一环。它的失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甚深。对此,严复曾言:“(康、梁)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②胡思敬也有过相似的看法:“(康有为)负乘小才,喜事锐立名誉”。^③认为亡清社稷者,康、梁也。陈恭禄评价说:“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阻力,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④语虽尖刻,但如果辩证地看,康氏本意在“救清”的改革,最终的确大大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崩溃。注意到这个客观效果,才能对康有为的历史功过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

责任编辑:侯德彤

Rethinking Kang Youwei and the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Study of *Wuxu Lǚ Shuang Lu*

Li Zehao

School of Marxism,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narrative, Kang Youwei's image underwent an increasingly fading process, from a figure leading the historical trend during the Wuxu Reform to someone increasingly "conservative" and even gradually "lagging behind" the times. If his personal traits are not comprehensively measured, the true reason behind the process cannot be understood. *Wuxu Lǚ Shuang Lu*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famous traditional historian Hu Sijing in modern times. Although Hu's ideology is conservative, he truthfully reveals some major historical truth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 concep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form Movement, Kang Youwei, as an ordinary scholar, actively campaigned and repeatedly called for help. Despite repeated setbacks, he spared no effort and never turned back. However, from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his personality and talent also played a negative rol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Reform Movement. This is by no means an underestimate of hi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reform. A flawed Kang Youwei is much more meaningful than a correct and perfect Kang Youwei in a possible world. Standing behind a flawed Kang Youwei can give people more shock and enlightenment. The 1898 Coup ultimately intensified the conflicts within the Qing Dynasty's ruling group and accelerated the collapse of this decadent dynasty. Onl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objective effect can we make a fairer evaluation of Kang Youwei's achievements and faults in history.

Key words: Hu Sijing; *Wuxu Lǚ Shuang Lu*; Kang Youwei

①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江西南昌退庐,1913影印本。

② 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32页。

③ 胡思敬:《赠左笏卿序》,胡思敬:《退庐文集》卷五,江西南昌退庐,1924年影印本。

④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86页。